

教育理论专题研究丛书
戚万学 徐继存 主编

儿童教育的人文解读

丁海东 杜传坤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教育理论专题研究丛书
戚万学 徐继存 主编

儿童教育的人文解读

丁海东 杜传坤 著



江苏工业学院
University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教育的人文解读/丁海东,杜传坤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教育理论专题研究丛书/戚万学,徐继存主编)
ISBN 978-7-5328-5947-4

I. 儿... II. ①丁... ②杜... III. 儿童教育—
研究 IV. 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3106 号

教育理论专题研究丛书

戚万学 徐继存 主编

儿童教育的人文解读

丁海东 杜传坤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3.5 印张

字 数: 23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5947-4

定 价: 24.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CONTENTS

专题一 儿童精神与教育	(1)
一、儿童精神的历史生成	
——基于种族进化史的视野	(2)
二、儿童精神的基本特质	(24)
三、儿童精神的永恒存在与价值	(59)
四、儿童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75)
五、儿童精神与儿童教育	(86)
专题二 儿童文学与教育	(101)
一、风景的产生与童年的消逝	(101)
二、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价值辨识	(113)
三、教育视野中的儿童文学	(130)
四、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	(142)
五、儿童文学与课程资源开发	(153)
专题三 儿童游戏与教育	(166)
一、儿童游戏本质观的演变及其主体性本质观的建立	(167)
二、儿童游戏的生活发生与发展	(176)
三、游戏:儿童精神的一种表达	(188)
四、儿童游戏与人文追求的自由	
——关于儿童游戏的一种文化学审视	(195)
五、游戏的教育价值及其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实现	(203)

专题一 儿童精神与教育



人文视野下的童年概念,无疑是一个已经跨越了生物学之意义论域的文化学范畴。儿童世界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精神的存在。对儿童精神的人文观照和解读,不仅是现代文明与教育捍卫童年、呵护成长的逻辑前提,并为现代教育追寻契合于童年生活的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也是人类认识自我和追溯自我由来的一个永恒命题。

本专题的研讨分五个部分依次展开:

一、儿童精神的历史生成。在种族进化史的视野内,依据个体与类的生物发生与精神发生的一致性原理,在个体的、类的、生物的、精神的各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的相互转化中,阐发人的完整生成在人类进化历史中的实现,并进而从人类原初文化的研究中,演绎儿童精神与人类最初的原始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表达之一致性的可能。当儿童精神可被视为人类原初文化的形式再现或重演,便意味着它逻辑地成为一种历史生成的可能。

二、儿童精神的基本特质。以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哲学分析路径,尝试从儿童的自我中心化、整体混沌性、潜意识化、诗性的逻辑等四个方面揭示出儿童之不同于成人的精神世界,并由此而打开和呈现童年生动的人文世界和生活世界。正是赖以儿童精神的独特表达,儿童的文化被浓彩重墨地涂抹上了生命的激情、本真、梦想与诗意。

三、儿童精神的永恒存在与价值。儿童精神始终贯穿于个体生命和人类精神发展的整个历史,由此而构成了人类精神与文化发展的持久动力和源泉。其永恒的价值在于:一方面,童年是每一个成人的精神故乡,童年时期的精神构筑起个体终生成长的根基与渊源;另一方面,儿童精神作为人类原初文化的浓

缩和复演,也是孕育人类精神与文化的母体。

四、儿童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启示。基于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峙所反映出的现代文明之困境,以及童年精神永恒的人文价值之取向,提出向童年回归、让童心复现,构建儿童精神在现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地位,疗治现代文明之弊病和精神之异化,以获得人文意义和精神家园重建的文化选择。

五、儿童精神与儿童教育。按照人的教育最根本的人文宗旨,观照儿童精神与童年文化就应当是儿童教育的根本职责和使命。基于儿童精神的永恒性和独特性,尝试探寻儿童教育的基本形式特质,以实现儿童精神在教育教学中的融会和解放。进而,通过考察现代儿童教育中“童年的消逝”,批判和反省教育教学中漠视儿童完整精神和自然天性的种种表现。由此鲜明地提出:理解、呵护与尊重儿童的精神与文化不仅是一种永恒的教育使命,更是现时代捍卫童年文化和善待儿童成长的必然要求。

一、儿童精神的历史生成

——基于种族进化史的视野

在种族演变和人类进化的历史视野内,个体与类的发生具有辩证的一致性。由此,儿童精神与人类最初的原始思维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的表达——原初文化便获得了一致的可能。当儿童精神成为人们考察人类原初文化的事实参照,便意味着儿童精神逻辑地成为一种历史生成的存在。

(一) 个体的生成是人类进化史的辩证的复演

完整的人是身心统一的人,所以,人的生成就是生物生成与精神生成的融合与统一。同时,人既是作为个体的人,也是作为类的人。这样,人的生成就有个体的生成与类的生成两个方面,考察人的生成就有观照个体与类的两种生成历史的必要。人的个体生成与类的生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既表现为个体与类生物生成的一致,也表现为个体与类精神生成的一致。前者是人类与动物界所共有的,后者因精神的属人特征而为人所专有。这二者又因人之生物性与精神性的融合而融合、统一而统一。

1. 个体与类生物发生的一致

个体与类的生物发生的一致性联系是进化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早在19世纪20年代,胚胎学家冯·贝尔(Von Baer, 1792~1876)就意识

到高等动物胚胎的发育阶段经历着其他较低等动物从低级种类到高级种类渐趋复杂的过程。他提出,生物胚胎的发育遵循着一个从普遍到特殊、从同质到异质、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过程或法则(后被称作是“冯·贝尔定律”)。这样,不同种类的生物发育最初都走过一段共同的历史。进一步讲,个别种类的动物发育走过了比它低级的固定种类所标志着的不同阶段或水平。因此,动物个体发育的不同阶段体现出动物界中固定种类之间的差异,或者说不同等级的动物种类预示出较高级动物个体发育的一般性阶段。动物个体发育的过程与种类发生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平行的关系,这一胚胎学的发现成为达尔文证明并创立生物进化理论极其重要的证据。其后,海克尔(E. H. Haeckel, 1834~1919)进一步依据“个体发生复演种系发生原则”,明确提出了生物发生的重演律(biogenetic law),认为生物的个体发育过程是其祖先主要发育阶段的再现,是漫长的生物种族进化历史简化了的、压缩了的复演。他于1866年在《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指出:“生物发展史可分为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部分,即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也就是个体的发育历史和由同一起源所产生的生物群的发展历史。个体发育史是系统发育史的简单而迅速的重演。”^①这里所谓的系统发育即为类的或种族的生物进化的漫长过程。依据这种生物发生的复演律,可以说“观察一个物种的个体发生就像看系统发生的快镜头影片”^②。

对于个体与类的生物发生的一致,当代的进化生物学者威萨特(Wimsatt)等所提出的“发展锁模型”的假设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类比。“发展锁”是由一些并排的转轮所组成的圆筒形锁。每个转轮都可转至若干个位置,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有凹槽,锁芯的固定轴可以借此通过。打开锁的过程就在于从左到右依次找准并排的每个转轮的位置。转轮之间是一种渐进的依赖关系,每一个转轮的开启都须以前一个转轮的开启为前提。生物的发展或进化犹如这个开锁的过程,它是“按照从左向右的开启方式逐级进行的,最左端是发展的最初的阶段,越是后期发展的阶段就越是靠右”^③。对于生物系统的生成而言,每一个转轮都意味着某一等级的种类,越往左端的就越古老、越原始,越往右也就越处于进化的高层次;对于生物个体的生成,每个转轮就代表着发展的某一阶段及特征,越往左端的就越幼稚或低级,但也越是根深蒂固而不易改变,越往右也就越接近于发育的成熟水平,但也就越具有变异的可能。“发展锁模型”类比地说明了在生物发展或进化的进程中,越是在前面的,个体发生与系统进化的一致也

① 李难主编:《生物进化论》,人民教育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② 刘晓东著:《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③ 吴国宏、李其维:《内隐学习的再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3期。

就越是稳定的、巩固的。其实,这也是对于“冯·贝尔定律”的进一步诠释。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①人的生成首先是生物性的生成。生物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性关系在人的生成那里同样存在。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最高水平,其进化走过了整个生命系统进化的历史。这样,个体的人的生物发生就是这个漫长生命进化历史的复演。

人类胚胎在母腹内的发育所经历的一般性阶段及其特征,表明“人胚发育是对于人类产生以前的整个生命史的复演”^②。与作为生命进化史开端的单细胞生物相对应,人类的胚胎发育从受精卵开始,并顺次经过桑椹期、囊胚期和原胚期等,再逐渐生成与脊椎动物同类的组织系统。最初,人类胚胎的发育类似于脊椎动物的胚胎。在出现性状分歧以后,开始具有哺乳纲动物的特征,并与该纲某些动物(如猪、兔等)的胚胎很难区分。在相当长的发育期里,人类胚胎与灵长类动物,特别是类人猿的胚胎保持着相似的特征。另外,人胚发育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始性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着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例如,在人类胚胎发育的第18~20周所出现的鳃裂,是所有陆生脊椎动物在胚胎发育中都要出现的原始体。这表明人类与陆生脊椎动物在进化史上共同起源于用鳃呼吸的鱼类祖先。发育两个月左右的人类胚胎会出现五个尾骶脊椎和长长的尾巴。在以后的发育中,第五个尾骶脊椎消失,尾则蜕变为骶骨。这种现象是对于人类有尾远祖的复演。五六个月大的胎儿身上大多浓密地长满了细毛,一般要在出生前才消失,这是重演了全身长有长毛的高等动物的特征。

人类不仅是在胚胎的发育中走过了整个生命进化的历史,而且在出生以后也依然会残留着人类史前的某些动物的结构特征。例如,在动物界中,雄性四足动物生有的乳房,反刍动物生有从来不发展到穿破牙龈的门牙,这些生理的器官或组织并不被当下持有的动物所必需。同样,人类身体的发育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譬如在人体的某些部位会有能牵引皮肤抽动的稀肉膜或薄肌(panniculus)。达尔文说:“高等动物的一切物种都有某些结构表现着一些残留的状态,不在身体的这一部分,就在身体的那一部分,例外是没有,人也不在这条通例之外。”^③这种现象不仅只是被达尔文作为了“人类从某些低级类型诞降而来的证据”^④,也是对于动物及人的个体与类生物发生一致的印证。

2. 个体与类精神发生的一致

人类的胚胎发育走过了人类史前的整个生命进化的历史,而人类的精神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② 刘晓东著:《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③ [英]达尔文著,潘光旦等译:《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页。

④ [英]达尔文著,潘光旦等译:《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育则是历经了人类自身的整个进化史。其中,作为人之个体精神的发育是类的精神发展史的复演,亦即个体精神与类精神的发生史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的关系。

关于个体与类的精神发生的一致,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早在19世纪初就曾明确地论述过。他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出:“每个个体,凡是实质上成了比较高级的精神的,都是走过这样一段历史道路的……”这段历史道路就是作为人类的“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是作为精神所已蜕掉的外壳,是作为一条已经开辟和铺平了的道路上的阶段而被个体所走过的。这样,在知识的领域里,我们就看见有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而且,我们还将在教育的过程里认识到世界文化的粗略轮廓”。^①关于人类的历史对于每个个体的意义,黑格尔还在另一部著作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有历史,……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点说,乃是一种工作的结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获创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②在这里,他把人的生成看做是人类历史的结果的观点,就蕴含着个体的精神发展是走过类精神史的含义。

当然,黑格尔对于个体与类精神发生之一致的提出,是建立在“逻辑决定历史”的基础上的,即认为历史发展的顺序展开,是因为一个思想承接另一个思想的内在逻辑。如他所说:“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③从而最终势必导致将个体对于类的复演视作是机械的、被动的,这正是其唯心主义的哲学表现。然而,黑格尔在哲学层面上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所揭示出的个体与类精神发生之间的平行性关系是极富有创见的。后来,随着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诞生,以及贝尔的胚胎学说和生物重演律的进一步提出,他的这种预见开始得到了科学(生物学)层面的支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个体与类精神发生的一致也是被承认的,只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历史绝非是自在的、被动的、机械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

① [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页。

② [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8页。

③ [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7页。

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他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①他还曾指出过,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承认了获得性状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一系列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在我们中间,一些数学公理对每个8岁的儿童来说都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从经验上来证明,这完全是‘累积的遗传’的结果”^②。恩格斯所说的这个“获得性状的遗传”乃是对个体的精神发生复演历代人类祖先的经验的印证或说明。

可以说,个体与类精神发生的一致性规律一经被人们所意识,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思考人类文化或精神现象的一种方法论。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及的是,在生物发生的复演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明确地提出以后,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中,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性规律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霍尔(G. S. Hall, 1844~1924)是20世纪初期最具有代表性地运用复演论解释个体心理发展的心理学家。他认为,胎儿时期的发育是复演了动物进化的过程,而出生后的个体发展则是复演了人类进化的历史。个体在幼儿阶段的心理及活动表现出人类远古时期最初的那种极不稳定的特征。8~12岁的儿童知觉敏锐,但安全意识、道德认知、人际理解及同情等能力都十分薄弱,这正是远古时期人类的精神特征。以后,少年时期那种感觉敏锐、记忆力强的精神,暗合于机械训练与陶冶的中世纪的文化特征,而青年期发展又是反映着新近人类时代的精神状况。其中,他把年幼儿童时期的发展对应于人类祖先的文明迭进而划分为动物阶段、蒙昧阶段、游牧阶段、农业/家族阶段和部落阶段,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依次反映出原初人类某些典型的行为特征。总之,应该把出生后的个体发展看做是一系列或多或少复演着人类进化历史的过程。人类进化史上最早出现的活动,在个体发展那里也最早地表现出来,而比较高级的、由意志控制的活动,则要到年龄较大时才出现。儿童身上浓缩和积聚了千百年来历代祖先的生命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讲,“儿童乃成人之父”^③。霍尔关于游戏发生机制的解释是基于复演论的基础上的,他把游戏看做是个体呈现人类原初时期

① [德]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③ [美]霍尔著,李浩吾译:《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2页。

生活的动作、态度、习惯和状态的活动,是重演史前人类祖先到现代人进化的历史。按照他的解释,儿童玩水是享受人类祖先打鱼时在海水中的乐趣;儿童爬树、摇树是重复类人猿在树上的活动;玩打猎、捕鱼、盖房子等是重复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儿童游戏的意义在于消除以后成年阶段中不再需要的一些原始本能。例如打棒球之类的体育运动可以让儿童去玩儿,但同时减弱了儿童原始的打猎本能。“种族的本能在游戏中找到了宣泄通道(cathartic role),从而获得更高级、更复杂的行为范例。”^①

另外,心理学家鲍德温(J. M. Baldwin, 1861~1934)、施太伦(W. Stern, 1871~1938)以及提出心理发展的成熟势力说的格塞尔(A. Gesell, 1880~1961)等,对于个体心理发展阶段的研究,也都深受了复演说的影响。鲍德温在其著作《儿童与种族的心理发展》一书中,试图勾勒出一个“个体发生复演种系发生”的“发生心理学体系”,并系统地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他不仅承认个体精神的发生复演着类精神的进化历史,甚至还认为,个体发展中的能动的“选择”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并预示种系发生的未来方向或轨迹。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似乎体现出了对于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二者关系的辩证把握。施太伦曾尝试把他所划分的儿童发展的阶段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对照,认为幼儿期(6岁前)对应着的是从哺乳动物到原始人类的阶段;意识的学习期(6~13岁)是人类古老的文化阶段;青年成熟期(14~18岁)则是近代文化的阶段。格塞尔则说过:儿童心理的发展“基本上是古代进化过程的表现”,儿童的机体“必须集中和重新组织祖先的基本经历。所以就其神经系统的复杂性来说,他是与其祖先的经历相匹配的”^②。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基于句法结构的普遍性指出,个体天生都具有一个称为“普遍语法的语言学习的初始状态”,“我们可以把普遍语法看做是人类‘原始状态’的一部分,即儿童的先于语言经验的心智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人类的种属特征,为人类所特有”。^③ 乔姆斯基所说的这个“普遍语法”即为人类祖先言语经验的积淀在个体发展中的遗存,是生命进化史的产物。

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理论也是“把个体与类的精神发生的一致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原则之一”^④。被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作为“本我”(id)人格组成成分的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是个体精神发展中先天就携带

① 黄进著:《游戏精神与幼儿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② [美]格塞尔著:《发展的周期》,参见瞿葆奎主编:《教育与人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③ 《外语学刊》编辑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④ 刘晓东著:《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着的内驱力量,是原始性的、非理性的、非逻辑的。本我在人格发展中最早出现,初生儿童的精神也只由潜意识所构成。这种“带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着有机体的过去”,“文化产物的某些部分无疑在本我中会留下它们的沉淀物”^①。荣格著(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曾明确地说:“童年不过是一种过去的状态而已。正如发育中的胚胎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我们的种族发生的历史,因此儿童的心理便重演了尼采所说的‘人类早期的功课’。”^②他所极力关注的个体精神生活中的所谓“集体无意识”、“原型”,在其来源上更是被他归结成作为类的“集体心理而不是个人心理”^③。集体无意识是由遗传保留的普遍精神,而它的“原始意象”通过遗传沉淀为原型。

皮亚杰(Jean Paul Piaget,1896~1980)的认识发生论强调“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④人类认识就是在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建构的,但这并不能影响皮亚杰对于个体与类的精神发生之一致的认可与运用。人类认识所发生于其中的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主动建构,依赖于作为“生命最普遍的特性之一”和“机体反应与认知性反应所共有的最一般的机制”^⑤的“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这种自我调节系统在发展中既是个体的,也是类的。为此皮亚杰明确指出,“任何一种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种系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渐进的组织,因而也就不能离开平衡”^⑥。实际上,正是这种个体与类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所共通的自我调节系统,作为二者获得一致性的纽带。皮亚杰说过:“在我们看来,我们并不相信,在儿童的思维和原始人之间可能的相似之处是由于任何遗传。心理发展规律的持久性就是解释这两方面吻合的道理,而且既然一切人(包括原始人在内)都是从儿童开始的,那么儿童时期的思维正像出现于我们自己的思维之前一样,也是出现于我们最远的祖先的思维之前的。”^⑦在这里,皮亚杰所谓的“遗传”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个体间的单个的遗传(而前面所说的精神分析理论那里的遗传是作为类的遗传,二者不可混同),而所谓“心理发展规律的持久性”,无疑就是永恒存在并发展着的自我调节系统的表现或结果。

事实上,皮亚杰在论述儿童认识发生发展的阶段及特征时,也的确多次有

① [奥]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纲要》,参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701~702页。

② [瑞士]荣格著,刘光彩译:《怎样完善你的个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③ [美]阿兰·邓迪斯编,朝戈金等译:《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④ [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认识发生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⑤ [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认识发生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8页。

⑥ Piaget, J. (1971), *Biology and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4.

⑦ [瑞士]皮亚杰著,傅统先译:《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意识地去与人类过去的思想发展水平及特征进行平行式的对比,探寻发展着的个体精神与已经作为发展成就的人类的精神文化之间所存在着的一致性联系,以证实“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成人反应,不仅包括许多原始社会的成人,而且也包括许多文明国家的成人”。^①例如,他曾提及儿童去自我中心化的倾向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领域里也是存在的:“解除自身中心化,这不仅是从童年到成人的过渡所特有的现象:天文学的整个历史就是连续不断地获得解放的历史,从天体被认为是追随人类的活动的时代(指引三个先知探寻耶稣诞生的星星)起,到仍然相信我们的时钟和量杆可以普遍应用于一切现象的哥白尼和牛顿的时代为止,都是如此。这还只是一个例子。”^②皮亚杰还指出,儿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现代的成人,但却往往类似于古代的成人。他说:“人们可以发现,7~9岁的现代儿童在解释抛射物的运动时,其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循环替换位移(autiperistasis)相一致(运动物被它行进时移置的空气推动)。而在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一个成人这样认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种观念对希腊人来说必然是一种常识……他们的常识致使他们(包括亚里士多德)像特定水平上的儿童一样进行推理。”^③他还说过:“在7岁左右,儿童就能够提出一些可以确切地称为原子论的解释,而这种情况在儿童开始数数时就已经发生了。让我们继续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回想到,希腊人在冥想到实质的突变以后就发明了原子论,尤其使人瞩目的是,第一个原子论者是毕达哥拉斯。”^④实际上,皮亚杰的关于儿童的主客体不分、“泛灵论”、“实在论”等认知特征的用词和描述,都可说是对列维-布留尔关于人类原始思维的特征描述的借鉴。所以,在认识发生论那里,个体心理发展被认为重演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儿童思维的发展历经了与原始人的思维发展相类似的过程。的确,有“这样一种事实: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是建立于个体与类的精神发生一致性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⑤。

仅由以上关于前人研究的介绍,就可见个体与类的精神发生之一致性的规律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理论的虚设,这是人类探索与诠释自身的由来与发展的有效的、可行的路径。个体发生过程是对于类发生历史的复演,这一观念是充满着辩证法的意味的。一方面,类的精神的发生必依赖于一个又一个的个体精神的具体发生,才可得以实现和展示,否则,离开了个体精神的类精神就是虚无

① Piaget, J. (1971), *Biology and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90.

② [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钊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2~93页。

③ Piaget, J. (1971), *Biology and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90.

④ [瑞士]皮亚杰著,傅统先译:《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⑤ 刘晓东著:《儿童教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的、抽象的。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又必须置身于类精神的进化历史之中，扎根于类精神的那一片土壤中，并通过对类精神发生历史的复演，从类精神的发生及发生的成就中获得自我精神发生所必需的养料与文化的滋润，从而“登上他所出生时代的文化巅峰”。

当然，无论是生物的发生，还是精神的发生，个体的人对于系统进化（自然的生物进化和人的精神或文化进化）的复演绝非是机械的、被动的、直线连续的、原样照搬的重复。正如胚胎学家 E·B·威尔逊(Edmund B. Wilson)所说：“个体发生经常表现的，并非祖先历史的确切的记载，而是多少有些模糊与不连贯的陈迹。”^①那种把个体与类的发展过程机械地等同起来的尝试或企图，是非辩证的、非发展的复演观的表现。霍尔的复演论就曾因此而遭遇诟病。个体的发展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复演，应该是一种能动地扬弃了的、简约化了的、浓缩了的、甚至是具有了跳跃性的复演。正是因为人类在进化中的能动性，个体的成长才不必只是复演类的精神历史而停滞于已有的文化成就，而是不断有所发明和创造。当新的发明和创造成为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概念、方法，它们就成为新的类精神，从而又作为后辈的个体发展所要经历的内容。如此，人类的精神文化就得以不断地向前迭进和代代传承，人类也就历史地“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②。恰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所说的，生命进化是一种不停顿的崭新创造，它的“总体进程中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形式创造”^③。

(二) 人类原初文化与儿童精神的形式性一致

个体的生成浓缩而辩证地走过了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那么，作为人类精神早期发育状况的表征，已经成为历史的原初文化便可在现代儿童的精神生活中得以重现。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在关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原初文化与儿童精神予以对照的倾向，即已意味着儿童精神是作为原初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代表。当然，儿童身上所呈现出的原初文化决然不会是历史上的原初文化的实在内容，那是一种已经从具体情境中分离出来，且被浓缩化了的的文化形式或文化意象。如此一来，儿童精神在其形式上就成为一种历史的生成。

1. 人类原初文化的“活化石”：儿童精神

雅斯贝尔斯称：“人是精神的，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④基

①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科学技术哲学》，1998年第6期，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③ [法]亨利·柏格森著，肖津译：《创造进化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页。

④ [德]雅斯贝尔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于人的生物性生成,并与之和合于完整的一体,人的精神的生成成为人的本质生成,人的精神的力量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力量。作为人之本质的生成与实现,个体精神的发生发展复演着、历经着整个人类精神进化的漫长历史,个体精神与类精神的发育过程辩证地存在着某种顺序及阶段上的相应性一致,这就意味着幼年时期的个体成长与最早历史上的人类在其精神发育的水平上存在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行性,亦即个体童年与类童年的精神发育是一致的。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就是人类栖息的精神家园,“人类的行为只能根据其独特文化加以解释”^①。作为类的精神发育的历史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或者说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记载了人类精神的成长进程。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②人类的思想文化在历史链条上的每一次向前延进,都是人类自我的精神朝向成熟与完善、自由与圆满的跨越与攀升。正是在人类文化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主体的精神发育走过了由低级的动物性向高级的社会性(或文化性)、从蒙昧的原始状态到开化的文明状态的道路,并由此而延展出一幅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追求自我完善与解放的历史长卷。冯·哈耶克(F. A. Hayek)曾引用他人的话这样说过:“文明及文化的历史乃是人类从一种近乎动物的状态迈向礼仪社会的一部历史;而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培育了艺术,采纳了文明的价值观,还自由地运用了理性。”^③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依据人类不断演进的“生存技术”为标签,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并延至现代社会的“文明时代”,^④也就是关于人类的精神发育处于不同水平或层次上的一种逻辑推定。现代广义的进化论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进化系统。”^⑤那么,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这个进化的线索,它反映的就是整个人类精神的进化。

既然漫长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记载的就是类精神的进化与演变,那么作为文化发展史上的最早文化形态,人类远古时期的原初文化就是类精神发育的童年呈现或表征。人类与文化的历史发端于人从动物界的脱胎而出,可以说,原初文化的历史要远比我们有史料可资查证和呈现的历史更漫长、更古老。它历

① [美]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② [德]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③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人类精神的三个渊源》,《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 按照摩尔根的界定,在蒙昧时代,人类发明了用火、渔猎和弓箭;在野蛮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畜牧业、农业和铁器;文明时代则是指以文字发明为开端直至现代社会的历史。

⑤ [美]E·拉兹洛著,闵家胤译:《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经了人类社会的整个远古时期(原始社会时期),并向古代时期延伸,当然,如果就其对于以后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而言,它贯穿了包括近现代历史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个体童年的精神辩证地一致于人类最早时期的类精神,也就是暗合或会通于人类原初文化的特质。马克思在对比地考察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史之后,就曾智慧地得出这样一个见解:“有粗野的儿童,有晚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这里可见,马克思对于古代人类的原初文化与儿童精神之间具有可比性的关联是予以认可的。在一定意义上,儿童的精神形态就是浓缩地、简约地载寓了人类原初的文化因子的“活化石”,儿童由此而成为沟通人类的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人类原初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中间环”。

如前面所述,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诞生以后,霍尔、弗洛伊德、皮亚杰等心理学家在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中,都把儿童的发展与人类文化的发展的早期阶段及特点进行着有意或无意的相互对比,从而在方法论上体现出对于个体与类精神发生的一致性原理的隐喻式的把握与运用。实际上,对于人之生成的个体与类的一致性联系,并非只是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其他的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关涉人类精神或文化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把人类早期文化与当代儿童的精神生活或状态予以联系起来意识倾向。

如果说,对于个体与类生成一致性规律的运用,发展心理学更多地是从人类原初思维的发展特点及规律那里获取借鉴或启示,以更好地着眼或服务于对个体发展的诠释的话,那么,在其他的人文学科领域,那些关涉人类原始文化和人类文化(或精神)进化的研究,则就是寻找或发现现代儿童的精神及生活状态中所遗留下的人类原初文化的痕迹或“碎片”,从而获得可以印证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及阶段的“活”的证据,并可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仅从远古遗址及原始器物的考察来搜集史料的不足。这首先是在人类学关于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透过人类学家们对于原始文化或原始人思维方式的研究及论述,我们往往可见他们对于个体童年与人类原初的文化方式及生活状态联系起来印迹,甚至尝试进行对应性地类比或比较。

早在黑格尔明确地提出个体与类精神发生一致的原理之前,18世纪的意大利人类学家维柯(G. Vico, 1668~1744)在他的文化学著作《新科学》中就蕴涵着与此原理相关的朴素观念。维柯认为,原始人像儿童一样想象力十分发达,

^① [德]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但理性思维的能力却严重不足,于是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就充满了作为“玄学”的“诗”的智慧,即“诗性智慧(wisdom of imagination)”。他也经常把一个民族从初建到最后瓦解或消逝,同一个人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进行相互类比。

而泰勒(E. B. Tylor, 1832~1917)的《原始文化》、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 1857~1939)的《原始思维》等著作中关于人类早期文化的研究就已经体现出了对于个体与类精神发生一致的方法论原则的自觉运用。泰勒在他的著作里充分论述了那些“早已丧失了它的用途、功能或意义”的“文化遗存”,并认为这些作为“化石文化”的“原始遗留物”不仅可被视作“文化路径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世界文明所实际走过的路径之迹”,^①而且它又可以在儿童的精神生活(如儿童的游戏、童话等)中遗存着、再现着。他说:“随着世界社会的向前发展,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可能渐渐地变成纯粹的遗留。它们的最初的意义逐渐消失了,每一代记得它的越来越少”,但是,“最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彻底地丧失存在的意义,“还没有完全为人民所遗忘”,还往往存在于儿童的游戏、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与风俗习惯中,是因为“它们跟古代文化的最富有教益的阶段之一有关”。^②从泰勒关于“文化遗留”的分析与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将儿童的精神形态及其演变看做是记载了那种古代的“最富有教益的阶段”的。泰勒时常地把生存于原始文化中的蒙昧人与现代文明中的儿童相对比。他说:“我们越是把各种不同民族的神话虚构加以比较,并努力探求作为他们的相似的基础的共同思想,我们就越确信,我们自己在童年时代就处在神话王国的门旁。”^③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对于原始人与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语言、制度、风俗、信仰等及其这背后的普遍性结构的考察,是以其对于“原始思维”的阐释为前提的。他借迪尔凯姆(E. Durkheim, 1858~1917)的“集体表象”概念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原始思维的状态是建立在“集体表象”的基础之上的。列维—布留尔的这种集体表象犹如后来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是超越了个体的意义,并掺入了许多情感意志的因素,成为支撑原始思维的深层根基。建立在这种集体表象基础之上的思维就是“首先关心神秘的属性和关系的、以互渗律作为最高的指导与支配原则的原始人的思维”^④。由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对于主客融合的“互渗律”的确信,集体表象中表象与表象之间的逻辑就是非分析性的关系,原始思维就又是一种既不追求因果律也不避免矛盾律的“原逻辑思维”。这种原始思维以及由此所生发的原始人的文化就犹如儿童的

① 王云五主编:《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第 289~291 页。

②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5 页。

③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5 页。

④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92 页。